

## 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一座房屋左右两端的大墙称“端墙”，这是一种较正规的称呼，乡人总是俗称其“山墙”。各地传统建筑的端墙有多种式样，在宁波主要有三种。

数量最多的是朴实的硬山墙，它沿着屋顶（屋面）倾斜的垂脊而筑，不超越屋顶（屋面），故这种墙的端面呈尖山形，也许“山墙”之称谓正缘于此座尖尖的“山”。因它造价低廉，普通百姓的房子往往采用这种式样，但它缺乏防火防盗功能，当然美感也不如其他两种。只因它数量最多，久而久之，只要是端墙，人们均称其为“山墙”了。

其次是马头墙，宁波马头墙的数量也不少。

再次是元宝墙，现存数量较少，得细心寻觅。本文展示的就是宁波市内的元宝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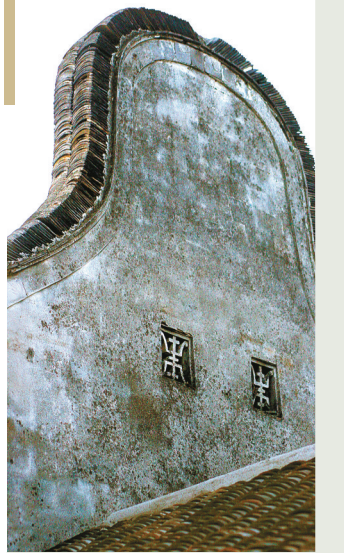
元宝墙的墙头高高伸出屋顶，与马头墙一样，也具有防火防风的功能。笔者认为，其美感虽稍逊于马头墙，但砌筑的难度小于马头墙。

单论建筑结构的稳定性，朴实的硬山墙当然最好，元宝墙的稳定性虽逊于硬山墙，但比马头墙强得多。

为什么称这类墙为“元宝墙”，得从“元宝”说起。

元宝是古代的一种货币，由白银或黄金制成。元宝起源于唐朝，正式把银（金）称作“元宝”是在元代。至元三年（1266年），朝廷为了防止不测，将各种大小不一的银锭、金锭统一铸成五十两重的，并且在背面加铸“元宝”两字，表示“元朝之宝”之意。从此“元宝”就成为银锭、金锭的通称，进而成为财富的同义词。

当时元宝多为平板型的，中间束腰，两端圆弧形，后来的元宝墙



▲慈溪市周巷镇劳家老屋的元宝墙。  
▼马头墙与元宝墙的穿插。（摄于宁海县箬岙）



余姚市牟山老街张房魏氏宅院的元宝墙。



元宝墙和马头墙的“嫁接”。（摄于月湖附近）

与其极为相似。中国人讲求吉利，在建筑上尤其如此，于是“元宝墙”之称不胫而走。

慈溪市宗汉街道新塘村的一个小地名叫“元宝山”，《慈溪县地名志》写道：“元宝山村，8户，24人。山，指大屋之山墙。初言村中一大户之山墙形似元宝，后遂成村名。”后来我去寻找这座大屋，没见到。问及89岁的陈永根，他说：“早就不见了，原是我祖上的屋。”之后获悉，他是明代南京工部尚书陈雍之后裔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元宝墙与马头墙一样，往往为大户人家所采用。

其实元宝墙还有一个称呼是“观音兜”。观音兜乃旧时妇女用的一种风帽，因帽子后沿披至颈后肩上，类似观音菩萨所戴的帽子式样，故名。从形态上看，我认为称“观音兜”比称“元宝墙”更贴切。

宁波元宝墙的“元宝”大小不一。慈溪市周巷镇劳家老屋的元宝墙算“大元宝”，而相距不远的周巷镇路桥村安仁桥桑家大屋（俗称“姚北第一家”），为慈溪文保单位的元宝墙是“小元宝”，可惜如今已被改为硬山墙了。

我曾在余姚见过不少元宝墙。如余姚城区“阳明古镇”中的周家宅院就有元宝墙。余姚保

存最好的元宝墙建筑群是牟山老街的张房魏氏宅院，宅院的端墙全部采用了元宝墙。泗门小祠堂路19弄1号内的元宝墙也很漂亮，不知如今安否？

在宁波，还能看到同一建筑中马头墙和元宝墙并存的现象。如庆安会馆建有14道马头墙、2道大元宝墙。秦氏支祠有17道马头墙，又有至少6道小元宝墙。宁海箬岙一老屋的端墙更奇特，上是元宝墙，下是马头墙。最典型的是位于海曙区平桥街的银台第，其桥厅为三开间平房，端墙为元宝墙，右邻楼屋是马头墙。

为既何有马头墙又有元宝墙？难道为了省钱？否！我想主要是为了满足主人追求形式多样的心理需求吧。这样的结合，其视觉效果已不止“1+1=2”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到了近代，宁波的乡绅富商建房时，在传统元宝墙的基础上加入了西洋巴洛克式的建筑元素，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在江北区新马路文化街区和月湖边还留下不少。

一次在月湖边参加晚会，看到一堵新建的端墙，左半边是马头墙，右半边是元宝墙。到底是马头墙的右边坏了，便补上元宝墙，还是元宝墙的左边坏了，便补上马头墙？不得而知。但足见宁波人推陈出新的智慧。

## 由“摸六株”想到《耕织图》

## 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以前，有人自嘲是做农民的，就是“摸六株”的。类似的说法还有“穿草鞋”“咬咸齑”等。总之，脏、累、苦都让农民给摊上了。

“摸六株”其实就是种水稻。在宁波一带，种水稻遵循一个规则：插秧插六株，耘田耘六株，割稻割六株。秧刚插下去时，每行六株，脚中间两株，左右各两株。这苗要分得均匀，横直株距要相等，而且要随时看前面插的秧苗直不直。有的地方还会每一块或两块拉一条种田绳。而耘田要“三耘”。“耘”，《广雅》解释其为“除也”，就是除草，培土。耘田时，农民双腿跪在淤泥中，头一遍，是为了让秧苗真正入泥，顺便拔掉稗草。第二遍，是为了促进秧苗分蘖，挖掉杂草。最苦的是第三遍，这时秧苗即将抽穗，锋利的稻叶如一把把向天的利刃，把耘田人的手脚割出血痕。更不用说脚在水里浸泡着，还要遭受蚂蟥叮咬。

在奉化，有布袋和尚教人“摸六株”的故事。布袋和尚名契此，号长汀子，是五代后梁时期的高僧。他体态肥胖，笑容常开，是弥勒的化身。他曾经吟过一首插秧诗：手握青苗种福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成稻，后退原来是向前。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农人插秧的情景，而且蕴含禅意，道出了进退的辩证法。

没有种过田的人，可能看到的是男耕女织田园生活的诗意和丰收的美好。可是，一饭一粥、半丝半缕都源自劳作的艰辛。南宋时，於潜（今杭州临安）县令楼璩，有悯农情怀，念农夫之苦、织女之寒，创作了《耕织图》。其中，耕图从“浸种”到“入仓”一共21幅，织图从“浴蚕”到“剪帛”一共24幅，真实详尽地记录了农作生产过程。每幅画，都配有一首八句五言诗。楼璩将《耕织图》呈献给宋高宗，得到皇帝的赞赏并且获得吴皇后题词。后来，以《耕织图》为

蓝本，不断改编、临摹、仿绘、镂刻、印制，从而出现了内容大致相同而风格各异的多幅《耕织图》版本。在清代，《耕织图》得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力推，不仅御令重绘且都亲自题诗。

尽管，楼璩的《耕织图》原图早已散佚，但《耕织图诗》流传至今。“绿野暗春晓，乌犍苦肩赧”“去草如去恶，务令尽陈根”“敢辞冒炎暑，但欲去莠莠”“经年苦艰食，喜见苗薿薿”，描写了农民一耕三耘的情景。从后世诸多的《耕织图》摹本看，内容和载体都得到了拓展，因为在中国古代，“农为天下之大本”，大多数农民目不识丁，图绘农事，目的是为了劝课农桑。农耕桑织工具的演变、技术的进步、产业的发展，自然能反映各朝各代的摹本中反映出来。《耕织图》影响深远，15世纪末就传播到日本和朝鲜半岛，后来还传到了欧美地区，在欧美国家也发现了以《耕织图》为题材的盘子、瓷器、壁画等。

回过头再说楼璩，字寿玉，又字国器，鄞县（今宁波）人，诗人、画家。“四明楼氏”是宋代宁波月湖畔的望族之一，在浙东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。清代李邨在《鄞东竹枝词》中赞誉月湖楼氏为宋代鄞县望族之首。而全祖望《湖语》中也提到了楼氏的昼锦堂、昼锦坊、登封阁和东楼。“四明楼氏”人才辈出，有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的楼郁，被誉为“四明孔子”“百世之师”。楼郁的孙子楼异，在任明州知州时，创立了高丽使馆，又造巨舶百艘直通海外。楼异有五子，皆入仕，楼璩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央视“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”上，有个舞蹈节目，以南宋楼璩《耕织图》为灵感，融合现代数字技术，实现艺术化的沉浸式呈现。绿树成荫、阡陌纵横，人们播种耕耘，怡然自得。虚实相间，穿越古今。今天，我们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。我们要传承、利用好传统的耕织文化，在青山绿水间，打造现代版的《耕织图》，奔赴绿色共富之旅。

## 母亲做的布鞋

## 慢时光

小乔

退休后，喜欢上了布鞋，县城几家卖布鞋的店，什么“老北京布鞋”“老陕快布鞋”，逛了个遍，最后在兴安南路一家小小的鞋店里找到了心仪的布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成了这家店的老主顾，每年会上几双。这一穿便是数年，布鞋成了我脚上的主流。

其实，我从小就是穿着布鞋长大的，在胶鞋、球鞋出现之前，大多数老百姓买不起皮鞋，只能穿布鞋，因此主妇大都会做鞋子。我妈算不上一个做鞋高手，但她做的布鞋穿起来很舒服。过年，我和哥哥都会得到一双新鞋暖脚。

我妈做鞋不是一气呵成的，过程甚至有点漫长，今天弄几张笋壳、硬纸板做鞋样，过几天又去隔壁阿姨家要点碎布头。又过了好长时间，在一个晴好的星期天，我妈拿出粮票差遣我去粮站买面粉。她在家让父亲卸下门板，搁在两根条凳上，然后把面粉煮成糊，拿出一块素色布摊在门板上，再将一块块布头用糨糊平平整整地粘在素色布上，放在大太阳下暴晒。干了以后，我妈会小心地撕下来卷成一筒放着备用。接下来，她会今天画个鞋面样子，过几天又剪个鞋底样子，然后比着我们脚的大小，仔细地用布一层层在鞋底上叠好，修好布边用重物压着。或许是秋天云淡的一天，我妈会拿出针线筐，找出顶针、麻线、黄蜡（蜡线用的），拿着鞋底端详一番后，开始下手纳底。我猜她在纠结到底从哪下手第一针才能纳出好看的图案，其实，我妈除了能纳出几个菱形，似乎也弄不出其他什么花样。纳鞋底的时间有点长，她平时要上班，还要洗衣、做饭，只能抽空纳几针。因此放学回家的我，总看到我妈不是在忙家务就是在打毛衣或者纳鞋底，手上有干不完的活。就像一只不停歇的蜜蜂，为我们家“酿造”着甜蜜。

一直到参加工作，我穿的都是她亲手做的布鞋，有棉鞋、单鞋，有花灯笼绒面的、黑布面的……这期间也穿过球鞋、雨鞋、凉鞋，但最喜欢的还是布鞋，感觉轻松、踏实。是因为针针线线里蕴含着我妈的爱吗？

一天，我妈在饭桌上开心地说了：“我们家最小的女儿也要工作了，该给她买双皮鞋喽。”要给我买皮鞋吗？内心一阵狂喜，但我假装淡定，低着头继续往嘴里扒饭。最小的孩子也有烦恼的，比如经常要穿哥哥穿剩下的衣服、鞋子等。就这样，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，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新皮鞋，一双半高跟的黑色单扣皮鞋，花了14元8角，是我当时大半个月的工资。但最终没有穿习惯，和柔软舒适的布鞋相比，皮鞋又硬又硌脚，何况当时县城的道路是江南特色的鹅卵石路。一句话，不舒服，穿了几次就扔角落积灰了。

渐渐地，本姑娘恋爱了，也爱漂亮了，竟觉得布鞋有点土气。穿皮鞋是累了点，可是洋气，穿起来挺拔显身材，再配上裙子的话就更漂亮了。之后，街上越来越热闹，各种店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其中当然也有鞋店，但都是卖皮鞋的。旅游鞋横空出世后，又多了很多旅游鞋专卖店。人们一改几双布鞋打天下的状况，选购了一双又一双各种材质各种式样的鞋子，于是家中忽然就多了一种叫“鞋柜”的家具。慢慢地，我妈不再做布鞋，因为她做的鞋在家里已没有“市场”。

有了儿子后，为了带孩子舒服点，我又穿过几双布鞋。鞋子是从日用品店买的，虽然样子不错，但粗糙，鞋子的搭扣也容易坏。一次鞋扣突然掉落，布鞋秒变拖鞋，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一脚踏空，竟从楼梯上摔下六七楼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传统服饰重新有了拥趸。我们夫妻俩喜欢中式唐装，于是又想起了布鞋，觉得唐装只有用布鞋配，才协调。仔细一找，才发现街上早已有了很多布鞋专卖店。

这辈子穿的鞋子有数百双了，兜兜转转之后重新爱上了布鞋，对母亲的思念也油然而生。“母亲牌”布鞋已经成了“过去式”，但它始终是我心中的最爱。布鞋带给我的是温暖，是回忆，是一首深情且充满爱意的诗。

## 介绍信、招待所及其他

## 道考古

叶龙虎 文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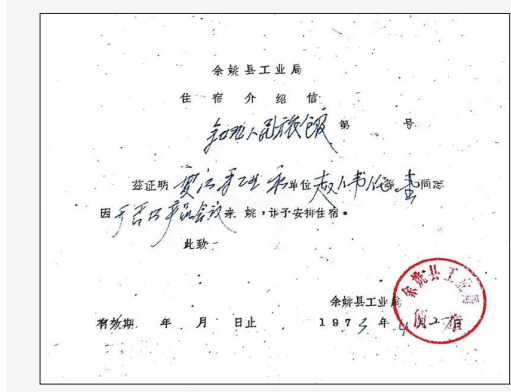
曾几何时，出门走亲戚或外出联系业务、参加培训、参加会议，买车票和途中住宿是一件十分烦心的事。

在20世纪80年代启用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之前，介绍信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文件，凡是出门需要住宿的，必须持有居住地政府或工作单位开具的介绍信（军人使用军人通行证）。

如果说介绍信是出门的“通行证”，那么粮票就是填饱肚子的“派司”。那时候，食品凭粮票供应，没有粮票寸步难行。省内出差，要备好地方流动粮票，出省要备好全国通用粮票，这样才能保证在途中或目的地吃上饭。

农民没有粮票。农村基层干部到县里开会，要计算好会议的天数，带好粮票。在旅馆、招待所办入住手续后，去食堂交投大米，换取相应的饭菜。如果想趁进城的机会买一些副食品带回家，就多带一些大米，吃不完的饭票可以到食堂会计处换取粮票，因为商店里的糕点都凭粮票供应。

住宿一般选择价格低廉的旅馆、招待所。那时候，以床计价，每张床的价格在1.50元左右，单人房间也不会超过3元。房间大多是6人间和4人间，由于房间小、人员杂，大件行李或贵重物品只能在前台寄存。前台办妥入住手续后，服务员会递过来一把吊着硬纸牌的钥匙，硬纸牌上写着几号房间几号床，再递上一只脸盆和一只热水瓶，退房时交还。有的旅馆的多人间甚至不给钥匙，让服务员开门，



单位介绍信



军人通行证

硬纸牌就是出入凭证。房门在室内是无法反锁的，服务员半夜会来查房。楼层中间是通道，两边是房间，其中楼梯口的头一间是洗漱间，最后一间是厕所。洗漱间极为简陋，一块长长的水泥槽板，沿路高，防止水溅出滴湿鞋子。水泥槽板上方是一根水管，等距离装着很多水龙头。如果想洗头，就要用热水瓶到伙房去灌热水。我记忆最深的是早上如厕和晚上洗漱，总要排队。

因为夜间房门是禁止反锁的，所以偶尔也会闹出笑话。记得有一年开全县大会，6人间住得满满的，一位姓丁的干部与我同住一个房间，我睡1号床，他睡5号床。一天早上，我睁眼看见5号床空着，忽然听见隔壁房间内人声嘈杂，这时老丁穿着短裤汗衫跑进来，说出洋相了，半夜上厕所回来走错了门了。

那时候，无论城市、乡镇，招待所和旅馆很少，要找到住的地方往往需花费很大精力。我好几次到上海住的是设在地下室的浴场，又闷又潮湿，而且规定晚上12点

浴场营业结束后才能入住。

在使用介绍信的年代，对住客管理也很严，即使是夫妻，如果没有带结婚证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住同一个房间的。我一个战友送我来探亲的妻子回家，途中住宿时因为没有带结婚证，只能分开住。81岁的赵伟伦先生告诉我，20世纪70年代他在余姚罗江手工业综合厂工作，有一天在宁波浙东旅社门口遇到一个老妇带着儿子、媳妇和孙子，因为没有介绍信无法入住。已经下午三四点了，回宁海乡下的车又没了班次。正一筹莫展，赵伟伦问明情况，给他们开了介绍信。当年为了开展业务，企业的工作人员常常会多带一两张空白介绍信。那家人千恩万谢，说遇到了好心人，总算不用露宿街头了。

根据我的日记记载，1975年4月27日，我入住位于杭州劳动路的省军区第二招待所，一位就是十来天。记得是四人间，住了三个现役军人，除了我，一个是20军60师炮团修械所的小梁，新昌人；一个是宁波市中队驻看守所班的班长，宿迁人。都是年轻人，虽然萍水

相逢也聊得投机，每天晚饭后就相约到西湖边散步。当时物资供应紧缺，很多商品要凭票，肥皂按人头供应。记得当时有两种肥皂，一种是杭州化工厂生产的西湖牌，一种是兰溪化工厂生产的凤凰牌。入住省军区二招后，允许每天买一块西湖牌肥皂。得知消息我十分兴奋，还懊恼两天信息不灵。因为回部队之前我要先回家一趟，所以托小梁和小代帮我购买，买了满满一篮，给正缺货的家里救了急。

20世纪80年代初举办的各类培训班，大多借用已放假学校的宿舍或党校的招待所，与今天相比，住宿条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，常常要自带被子。于是出门的基本装束是，背着背包，怀里揣一张介绍信，手里拎一只装着脸盆、热水瓶、碗筷的网袋。这种网袋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是用线绳编成的菱形格子的袋子，很实用。有一次培训班结束，为了赶火车，我背起被子就匆匆奔向车站，到家才发现装着脸盆、毛巾和茶杯、牙刷、牙膏的网袋被遗忘了，以致我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好几次梦到那只遗失的网袋。